

政治人类学评论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2016 · 1

# 政策人类学： 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政策

第 3 辑

Anthropolog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Policy-making (APAP):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d Public Policy

陶庆·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第 三 辑

政·治·人·类·学·评·论 (2016·1)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view

# 政策人类学： 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政策

Anthropolog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Policy-making (APAP);  
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d Public Policy

陶 庆 ·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策人类学. 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政策/陶庆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政治人类学评论. 总第3辑)  
ISBN 978-7-5520-1611-6

I. ①政… II. ①陶… III. ①政策科学—文集②社会人类学—文集 IV. ①D0-53②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7712 号

### 政策人类学：新政治人类学与公共政策

---

主 编：陶 庆  
责任编辑：路征远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mailto:sassp@sassp.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1.25  
插 页：2  
字 数：284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1611-6/D·408 定价：7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办**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人类学研究所（筹）

**主 编**

陶 庆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骏 王浦劬 朱光磊 刘建军 阮云星 李俊清 和少英 何国强  
范 可 周 平 周大鸣 罗红光 林尚立 金太军 赵旭东 竺乾威  
郭苏建 徐 勇 徐杰舜 钱 杭 高丙中 商红日 常保国 董建辉  
纳日碧力戈 蔡 骥 Chuan-Kang Shih

**编委主任**（以姓氏笔画为序）

徐 勇 高丙中

上海师范大学应用文科振兴计划“学术刊物”类建设项目

“《政治人类学评论》（培育）”

资助成果（A-0233-16-005017）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重大项目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

资助成果（11JJD810018）

# 人类学研究对政治学的意义(代序)

林尚立

回到人自身,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社会与国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动力所在。中国政治学也必须回到这里寻找发展的力量,在这方面,应该充分重视人类学对政治学的补益作用。

人之伟大在于其能够根据客观世界的条件以及主观世界的想象,建构出用于协调与改善自身生存与

发展的生活世界,在这其中,人类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人类的文明由此诞生和发展。人创造了生活世界,同时,生活世界也创造了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犹如万花筒,然而,这一切都不外来自人类创造的四大要素的发展及其变幻组合,即语言、艺术、制度

---

作者简介:

林尚立(1963—),福建闽侯人,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以来志在“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同名论文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与技术。人是具体的，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因而其所发展出的语言、艺术、制度与技术是不同的；与此同时，语言、艺术、制度与技术，基于人所处的时空差异，所形成的变幻组合也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以及人类文明生活的复杂性。

人类生活的现实基础就是两个：一是物质财富；二是组织秩序。两者相互依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这两个现实基础；人类也正是为了这两个现实基础，创造了语言、艺术、制度与技术，并对其进行不断的变幻组合。所以，研究人类生活的科学的路径就是回到具体、回到整体，即回到有整体意义的具体和有具体规定性的整体。在这方面，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及其成果给了人们的启示往往是具有震撼力的。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社会生活是通过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展现出来的。对人的认识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这种认识和研究，一方面，是哲学的，关注人的本质与价值；另一方面，是人类学的，关注人的实在与行动。人是天生的

社会动物，要过社会公共生活，为此，人类创造了政治，过政治生活，成为政治动物。所以，政治既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果。政治的使命就是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这决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围绕着公共生活的组织与治理展开的，权力与权利的制度安排是其研究的核心，权利的制度安排涉及人、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结构与关系；权力的制度安排涉及政体与政治制度。尽管政治生活的核心主体是人，但因为政治生活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形成，这使得政治学研究对于制度的关注往往强于对人的关注，即使关注到人，也常常是把人的实际存在纳入制度的存在，从而把人作为一种政治人或政治动物来看。这种思维的路径依赖使得政治学研究在追求优良的政治生活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制度从具体的时空中抽象出来，从而舍弃了制度背后的人的因素。这样，制度在实际的建构与运行中，就逐渐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来驾驭人的生活 and 思想。一旦制度抽象为异化的力量，制度就不是为人服务的力

量,而成为改变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决定力量。为此,这种异化力量常常被赋予某种崇高价值,从而获得神圣性。在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力图扮演这样的角色。实践表明,现实制度一旦从现实中被抽象出来,很快就会变成抽象的制度,在某种崇高价值的支撑下,也就很快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现代政治学很多时候就是从标准的制度模式出发来思考现实政治问题的,并由此来评判现实政治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这种思维逻辑与研究路径,在人类学看来是极其荒诞的。因为,任何制度,不论其多么强大和先进,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与社会而得以确立和运行的。抽象的制度能够改变人,而具体的人也能改变制度,如果制度与制度中的人不能达成文化意义上的协调,再好的制度最终也只是形式的存在。这就意味着政治学对政治生活的认识和把握,不仅要关注制度本身,更要关注制度中人的生活。仅仅从制度研究制度必然陷入教条,因为,文本中规定的制度与实际运行的制度肯定是两码事,而这其中的差异,只能从人的观

念、心理、行为与习惯等诸因素来解释,在这方面,人类学的研究与发现往往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解释力。

当传统的政治学更多地从制度和价值层面来考虑人的政治生活的建构与发展的时候,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则更多地提醒我们必须从实实在在的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去认识和把握政治生活本身。在人类学看来,任何制度与观念,不论其多么先进,都是人建构起来的,都逃脱不了人类的基本规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最原始的社会组织与管理之中,或在最日常的住宅小区的治理之中,看到最现代的西方民主运行的原则或制度模式。换句话说,任何制度与观念都是有人类理性基础的,都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确立起来的,因而,不论其源自何方,都可能在人类社会的任何角落生根。然而,也正是基于这个特性,人类社会的任何角落要移植一种制度与观念,都一定是从自身的需要、习性和实践基础出发的,其最终的形态一定是具体的制度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相互适应、相互改造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一旦有了人类学的视角和观察,简单的



通则就会在生动的事实中呈现出各种新型的关系与结构，从而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之源和智慧之根。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应该充分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政治人类学的贡献对政治学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背后学术支撑，就是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现代化把一个个国家纳入人类的共同历史运动之中，于是，建设现代国家就成为各国现代化发展共同面临的基本政治任务。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形态就是民主共和。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运动中被民主化所绑架，把传播、移植和实践标准的民主化作为基本的学术任务和理论使命，以至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无不与民主化发展有关。这种场景的出现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民主的价值与形态出发去把握民主化，去建构民主制度，而没有更多、更深刻地考虑民主化的人类学基础。我们至少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民主发展的人类学

基础是什么？我相信，如果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民主化实践的认识就会客观许多，许多国家就会直接避免因照搬西方民主化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与现代化危机。同样，有了人类学的视野，许多国家就能正视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就能在民主化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与改进，以保障民主化在本土的顺利实践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应该充分关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多从人类学或者政治人类学的角度研究与思考中国政治发展问题。

中国是有历史、有文化的大国，中国的成长必然有自己的逻辑和路径。因而，中国政治学在回答中国自身政治发展问题的时候，必须更多地要研究中国人自身。对中国人自身的关怀，就意味着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关注，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就是从对宏大的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具体化对在这种历史与文化中形成的中国人心智结构与行动模式的关怀和研究。这就需要政治人类学的努力。中国的政治学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等视为绝对的

政治学经典,但却很少有人从中去体会当年马克思力图从人类学来解释政治生活,把握政治本质和政治发展基本规律的学术追求与学术境界,结果,中国政治学不断地运用这一政治人类学的经典学术成果来建构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却不发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这是匪夷所思的。

人文社会科学是在不断思考和回答人以及人类的最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回到人自身,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社会与国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动力所在。中国政治学也必须回到这里寻找发展的力量,在这方面,应该充分重视人类学对政治学的补益作用。

原载《文汇报》,2009年9月13日,第008版

# 目 录

---

人类学研究对政治学的意义(代序)	
/ 林尚立	1
1 政策人类学“五性统一”的文化整体观	
/ 陶 庆 于澍原	1
2 《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中的政策人类学思想	
/ 陈津京	53
3 政策人类学的历史光芒与现实困境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五性”分析	
/ 耿浩雪	93
4 《国家的视角》的政策人类学光芒	
——“五性”统一的分析视角	
/ 于澍原	131
5 政策人类学“五性”统一视角下的《菊与刀》	
/ 徐如飞	175

6 政策人类学范式中的《政治嵌入与政治安排》 / 张科甲	216
摘要(英文)	253
后记	320
征稿与撰稿体例(修订)	322

# CONTENTS

---

## Preface

### **The Significance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o Politics**

/ LIN Shangli 1

### **1 The Cultural Holism for Unification of Five Characteristics in APAP**

/ TAO Qing YU Shuyuan 1

### **2 The Thoughts of APAP in *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 CHEN Jinjing 53

### **3 The Historical Light and Realistic Paradox of APAP**

—The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 GENG Haoxue 93

### **4 The Light of APAP in *Seeing Like a St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Characteristics”

/ YU Shuyuan 131

<b>5 The Perspective of Unification of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APAP on <i>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i></b>	
/ XU Rufeï	175
<b>6 <i>Political Embeddedness and Political Arrangement in the Paradigm of APAP</i></b>	
/ ZHANG Kejia	216
<b>Summary (In English)</b>	253
<b>Epilogue</b>	320
<b>Calling for Submissions (Revised)</b>	322

# 政策人类学“五性统一”的文化整体观

陶 庆 于澍原

**摘 要:** 政策人类学(Anthropolog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Policy-making [APAP]),在学科范式上是新政治人类学在公共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科学应用与政策实践,是政治—行政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法治主义公共管理而非管治主义公共管理等思维观念之阐发;在研究范畴上与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特别与“英美”应用(公共)人类学(applied/public anthropology)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也有本质区别,是政治科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交叉融合而非文化人类

作者简介:

陶庆(1965—),安徽宁国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政治(人类)学专业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博士后,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师范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

于澍原(1991—),男,福建福州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

项目资助: 本文系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10018)“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阶段性成果;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校级课题“政策人类学视野下的公共治理发展”(A-0230-16-006001)资助成果。

学或“英美”应用(公共)人类学长期以来“独享”旧政治人类学等学术话语权的新型研究领域;在学术内涵上按照一般系统论原理探索“五性要素”(five characters of APAP)“内在问题导向性”(inner problem-oriented research)、“参与观察性”(participation-observation for others)、“互为他者性”(otherness for both interviewer and interviewee)、“利益公共性”(publicity of interests)、“政策科学性”(scientificality of policy-making)等内在整体性逻辑。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逻辑源于古希腊智者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的逻辑思维,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从亚氏整体论出发,于20世纪30—50年代,提炼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之和”的重要理论。他认为,这一论点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贝塔朗菲在批判性总结机械论和活力论的基础上,引出整体论(机体论)观念,逐步演绎为通用于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般系统论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一般系统论”是“文化整体观”的哲学基础,因此“文化整体观”首先在哲学(美学)等思辨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与演绎。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卡西尔在这里看到了“符号”的价值与意义,但把人类社会活动的“符号”引向文化层面,则归功于后来的哲人。美国学者苏珊·朗格强调“符号”的文化本质特征,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类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可见,人类社会活动中充斥着丰富多彩的“符号”文化形式,它能够建构起文化整体的观念。再如,法国学者亚历山大·柯瓦雷则指出,社会活动等社会事实,无论其表现形式多么复杂多变,但仍可以假定一种内在的统一。人类文化的世界试图把杂乱纷离的事实理解为一种体系,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以上这些“整体论”论述及其引向“文化”维度的创意,只是停留在哲学思辨的空间,而缺乏社会实践的现实支撑;从社会实证、“田野工作”视角真正建构起“文化”具有“整体性”理论的,是社会人类学家英国学者拉德克利夫-



布朗(Raddiffe-Brown, A. R.)。文化整体性的观点是将任何存续的文化都看作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在这个统一体或系统中,每一个元素都有与整体相联系的特定功能。就这样,不同于哲学思辨而注重社会实践特别是注重“田野工作”的文化整体观(cultural holism),作为社会结构支撑的“新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诞生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文化整体观,打通了田野工作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者必须亲身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中,在直接接触互相了解的过程中,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起民主平等、相互信赖关系,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决定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拉德克利夫-布朗把这种基于“田野工作”及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平等互动的良性关系,提升到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等史无前例的高度。他着重强调“文化整体观”下的学科理论建设,学科内部所有研究者在相同意义上接受和使用的专业术语,以及由这些专业术语所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概念体系,是任何一门新学科新领域产生发展的必要前提。

政策人类学“整体性”逻辑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多元民主性与部分真理性的统一。在这一方面,它传承了政策科学的全部精髓与核心内涵,并突出地表现在政策科学的“元理论”及其“学科整体观”上。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Lasswell, H. D.)在1943年就倾向于“学科整合”的“系统理论”即“元理论”。他坦率地承认,就其个人的能力所限,要把一个人的时间投入到系统的理论是不合理的。而就一个时代的趋势发展而言,只要这一趋势被关注,政策科学在理论层次上整合的需要及其学科整合的需要,就会比以往更加明显,因而也能够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承认。“政策科学性”毫无疑问首先在于突出“科学”价值,政策人类学从“内在问题导向性”出发,经由“参与观察性”“互为他者性”“公共利益性”,最终目标在于这一研究系统的“科学性”——理论与事实相一致的“真理性”——反映了人类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实践真理检验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思维,即“政策科学性”的这一“科学”价值观。与此同时,政策人类学沿袭拉斯韦尔关于科学服务于民主的初衷,遵循为实现人的尊严的民主的学问的学科定位,始终坚定“民主”这一质的规定性;只有当公民们能够成为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的最后决策者与实